

論中國紀行文學的發生與確立： 以劉歆〈遂初賦〉為中心[△]

丁涵^{*}

摘要

紀行賦在兩漢燦然勃興並卓成一體，不僅呈露在作品數量上，更體現於諸凡主題內容、體裁結構、遣詞用典、精神風貌等諸多文體表徵，這些共同構成了賦在紀行文學中的書寫機制（convention），以致後世賦家推尚模範不輟。本文旨在對起自《詩經》，迄至西漢末劉歆（ca.53B.C.-23A.D.）之〈遂初賦〉的這一段被之千載的紀行賦誕生全景進行全盤回顧，進而爬羅剔抉作為紀行賦生發源頭的《詩經》、《楚辭》及漢初騷賦中涉及行旅的篇章，斟證最早期的述行紀錄對紀行賦雛形初態的塑成影響，最終揭窺〈遂初賦〉在主題、結構、語言、程式上對紀行賦乃至整個紀行文學形成的樹幟意義。

關鍵詞：紀行賦、〈遂初賦〉、書寫機制

[△]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一般項目「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唐宋紀行賦研究」（GD17CZW04）階段性成果。

^{*} 中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研究員。

一、前言

美國學者康達維 (David Knechtges) 在〈道德之旅：張衡之『思玄賦』〉一文中談到：「在文學體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是關於書寫機制 (convention) 所起的作用。」¹在進入賦體文學層面，他考察了「書寫機制」對賦的流變所起到的催生與禁錮正反影響，²也即同一主題的賦既得益於傳統恩澤，又受制於慣例束縛，於是後世的作家在面對同一主題創作時，會帶著鐐銜去掙脫，這就會造成代有升降、文法相沿的局面，即便主題雷同，賦亦是各極其變，各窮其趣。

而在各種賦之書寫機制中，康氏認為「最吸引人之一就是其『旅程』的主題」。³不過，學界早期對這一主題似較多熱衷於霍克斯 (David Hawkes) 所謂「虛幻的旅程」一支，⁴而冷落了另一脈「真實的行程」。這在多篇關於「旅程」(itineraria) 主題的論著中可見一斑，如霍克斯〈尋覓女神〉和康達維〈道德之旅〉二文，⁵研究重點均集中於超自然的虛構的時空旅程。

其實「紀行」(或曰「述行」、「行旅」)在中國被視作與朝政關涉最為密切的重要主題之一進入批評家的視野，最早可追溯至南朝梁代。嗣後，這種以實際行旅為主題的分賦標準對洎乎明清的賦集之遴選、賦作之注解和賦論之建構均有深遠的影響意義。⁶稍顯遺憾的是前人未對「紀行」和「紀行賦」進行清晰且系統地闡釋。即便如唐代李善 (d.689) 在注《文選》時對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和潘岳〈西征賦〉分別嘗試作出題解，⁷但僅僅是從書寫方式的角度模糊地道出了「紀行賦」是作者將自己在途的行蹤以時空交織來表現。直至晚近，紀行賦的源流方引起關注。清人孫梅在《四六叢話》中曰：「〈西征〉、〈北征〉敘事紀遊，發揮景物，〈涉江〉、〈遠遊〉之殊致也。」⁸近人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也持相同看法曰：「〈西征〉、〈北征〉，敘事記

¹ David R. Knechtges, "A Journey to Morality: Chang Heng's 'The Rhapsody on Pondering the Mystery'," in Chan Ping-leung ed.,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Hong Kong: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82), pp.162-182.

² 同前註。

³ 同前註。

⁴ David Hawkes, "The Quest of the Goddess," *Asia Major* (new series) 13 (1967): pp.71-94, rpt. in Cyril Birch 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42-68.

⁵ 同前註。

⁶ 參見拙作：〈唐代古文家紀行賦探微〉，《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7)，頁16-26。

⁷ 例如李善在班彪〈北征賦〉題下援引〈文章流別論〉曰：「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於班昭〈東征賦〉題下同樣援引曰：「發洛陽至陳留，述所經歷也」；又為潘岳〈西征賦〉作題注云：「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9，頁425、432、439。

⁸ 〔清〕孫梅：《四六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卷3，頁3。

遊，出於〈涉江〉、〈遠遊〉者也。」⁹更不乏當代學者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黃侃在其《文選評點》中說何焯（1661-1722）以為庾信〈哀江南賦〉憲章潘岳〈西征賦〉，而他自己認為庾、潘二人之賦「皆自〈遂初〉出」，而「彼（〈遂初〉）又本〈九章〉」。¹⁰伊藤正文的〈所謂紀行之賦——以〈遂初賦〉、〈北征賦〉為中心〉和康達維的〈漢賦中的紀行賦〉二文，不謀而合地指出班彪〈北征賦〉受到劉歆〈遂初賦〉的啟迪，並仍存有如〈遠遊〉、〈大人賦〉等早期辭賦中描寫幻想旅途的殘痕。¹¹此後，葉幼明、鄭毓瑜、蘇慧霜、劉敏、李元旭等人均論證了《楚辭》在主題、情感、技法上對於紀行賦的直接影響。¹²另有王允亮〈漢魏六朝紀行賦考論〉一文考證了《詩經》為紀行賦的發生提供了最初的資源。¹³

除卻在推本溯源的層面上研究紀行賦，還有對作家作品的個案探討，如郭維森、許結、彭春豔、徐華等人推定了紀行賦史上的首篇——劉歆〈遂初賦〉的創作意義、背景或時間。¹⁴沼口勝、蘇瑞隆等人剖析了兩漢紀行賦中的變格——馮衍〈顯志賦〉的藝術特質。¹⁵而在書寫方式的層面，鄭毓瑜總結道：在劉歆〈遂初賦〉中，客觀的地理伴隨現實旅程逐步推進，主觀的地理象徵着顧懷往的心神遠遊，因而空間被歷史化，首創了「因地及史」的模式。¹⁶此外，在修辭手法的層面，王思豪注意到劉歆〈遂初賦〉在用典上頻密徵引《左傳》，意在「以賦傳經」，藉此引申到鄭毓瑜提出的「史——地」的書寫範式應修改為「賦——經——史——地」，因而迥異於神遊、仙遊賦類的書寫風貌。¹⁷

⁹ 劉師培：《論文雜記·概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6。

¹⁰ 黃侃撰，黃焯編次：《文選評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7。

¹¹ 伊藤正文：〈所謂紀行について——『遂初賦』『北征賦』をめぐる〉，見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事業會編：《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57-76。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in *Transactions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9), pp.1-23.

¹² 葉幼明：《辭賦通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頁97-98。鄭毓瑜：〈歸反的回音——漢晉行旅賦的地理描述〉，見衣若芬、劉宛如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135-192。蘇慧霜：〈論屈原作品和騷體紀行賦〉，《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0），頁91-98。蘇慧霜：〈唐人祖述屈騷探微〉，《中國楚辭學》第3期（2009），頁288-306。劉敏、李元旭：〈漢魏六朝紀行賦論略〉，《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2），頁80-85。

¹³ 王允亮：〈漢魏六朝紀行賦考論〉，《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2012），頁61-64。

¹⁴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頁164。彭春豔：〈劉歆『遂初賦』、『甘泉宮賦』作年新考〉，《蘭臺世界》第10期（2014），頁147。徐華：〈劉歆『遂初賦』的創作背景與賦史價值〉，《文學遺產》第2期（2013），頁29-38。

¹⁵ 沼口勝：〈馮衍の『顯志賦』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41號（1979），頁29-37。蘇瑞隆：〈世變時移下的紀行與述志：以馮衍『顯志賦』為中心的探討〉，《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12），頁149-150。

¹⁶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74-75。

¹⁷ 王思豪：〈『遂初賦』用《左傳》事典的學術史意義〉，《文學研究》第2期（2015），頁34-45。

而現今對紀行賦的各種研究幾乎都不會迴避對「紀行賦」的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屬康達維的〈漢賦中的紀行賦〉一文，賅括了「紀行賦」的三大文體特徵：首先，旅程行止不限於單一的地點；其次，旅行述錄是真實的而非幻想的；再次，賦的功能更趨向反映個人化的情志。¹⁸康氏的觀點被評述兩漢紀行賦起訖變常的學者們所普遍接受，¹⁹並且為將視距延伸到漢朝之後的紀行賦研究提供了依據。²⁰綜上所言，目前學界對紀行賦的檢討在各個層面均是相對活躍的，然而其間亦存有兩個問題亟待梳理：一、劉歆〈遂初賦〉的誕生是否不只是象徵了紀行賦的開端，而更應當意味着整個中國紀行文學的正式起點？二、因為賦的多源性而且其不同源頭施加了對賦不同程度的影響，是否能將此情況對應到紀行賦的發生過程中？對此，必須對紀行賦的本質及生成經過再作全面審視。

二、《詩經》中的紀行要素

王允亮在談到紀行賦的淵藪時曾指出：

《詩經》中〈東山〉、〈六月〉、〈何草不黃〉等篇章，皆是記述作者在行旅過程中的所見所思，可視為這類文字的濫觴，尤其是〈六月〉中「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薄伐獫狁，至於大原」，「來歸自鎬」等句子，已經出現了具體的行程地名，和後世之紀行賦的常用手法頗為一致。²¹

引述中所謂「後世紀行賦的常用手法」，王氏並沒有具體地在《詩經》中尋根究底。筆者歸納，第一類是出現有點明單向的起、止點的地名文字，還有標示啟程的動詞、方位方向詞的詩篇，如：

¹⁸ 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pp.1-23.

¹⁹ 于浴賢指出，劉歆〈遂初賦〉、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蔡邕〈述行賦〉這四篇漢代紀行賦體式、內容基本類同，皆以記敘征行地點的人文、地理、歷史、掌故為主要內容，借詠史以述志。于浴賢：〈六朝紀行賦繁榮之鳥瞰〉，見周勳初等編：《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386-402。

²⁰ 王琳指出「因地懷古」的程式是漢魏晉紀行賦是一大特色。參見王琳：《六朝辭賦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120。程章燦指出「橫向的空間順序（結合時間順序）」與「縱向的時間順序（結合空間順序）」這兩種極具凝聚力和涵括量的結構形式在晉代紀行賦家手中終於完善起來了。參見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181。

²¹ 王允亮：〈漢魏六朝紀行賦考論〉，同註13，頁61-64。

《國風·召南·草蟲》：「陟彼南山，言採其蕨。……陟彼南山，言採其薇。」²²

《國風·鄭風·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闔闔，有女如荼。」²³

《國風·魏風·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岡兮，瞻望兄兮。」²⁴

《小雅·北山之什·北山》：「陟彼北山，言採其杞。」²⁵

《小雅·都人士之什·何草不黃》：「有棧之車，行彼周道。」²⁶

在上列作品中，「陟」是形容由低向高攀登的動作，此外還有「出」是形容從內到外的動作，「行」是形容役車奔馳的動作。而諸如「南山」、「北山」、「東門（鄭國都城東門）」、「闔闔（城外曲城的城門）」、「岵（草木繁茂的山）」、「屺（无草木的山）」、「岡（山脊）」，雖大多今已不知其確切所指，但這些文字仍然籠統地道出了起點或是終點的方位、地形。²⁷這些起程動作、往來地點至少構成了記程的最基本單元。

第二類則出現了同時交代起訖方位以及行動主體的詩篇，如：

《國風·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²⁸

《小雅·鹿鳴之什·出車》：「我出我車，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兮。……我出我車，於彼郊兮。……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出車彭彭，旂旒

²² 周振甫譯註：《詩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0-21。

²³ 同前註，頁 129。

²⁴ 同前註，頁 152-153。

²⁵ 同前註，頁 335。

²⁶ 同前註，頁 393。

²⁷ 李炳海認為《詩經》中的「東門」、「南山」等空間方位反映的是古代的房屋走向、吉凶觀念、語言習慣、思維定勢。參見李炳海：〈《詩經》中的空間方位選析〉，《中州學刊》1991 年第 3 期，頁 105-110。張民權則認為這些地理位置除了有的帶有方位性實義外，其中大多數都有其特殊意義和用法，比如「東門」之「東」有外出之義，「南山」又往往有遠方之義。參見張民權：〈《詩經》中的「東門」和「南山」〉，《文史知識》第 2 期（1995），頁 113-116。

²⁸ 周振甫譯註：《詩經譯注》，同註 22，頁 220。

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²⁹

在前一首詩中，以第一人稱「我」申言，用「徂」和「來」這兩個動詞表示一往一返的行爲，而「東山」則是其徂征的目的地，亦是其返回的起始點。在後一首詩中，主人公「我」在派遣好兵車後駐於城郊待命，此行是從「天子居所」受王命而來，隨大將南仲前往「朔方」筑城。除了概述陟遐，還穿插點染了沿途的時景差異：之前出發時，正值夏初麥苗青青；而今凱旋回師，卻已隆冬大雪滿途。這兩首詩具備行程的各個要素，特別是後一首詩將行程的準備、經過、和終結都完整連貫地作了筆述。

第三類更出現了人物、時間、地點注明得愈發細緻明晰的詩篇，如：

《小雅·彤弓之什·六月》：「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於三十里。王於出征，以佐天子。……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薄伐獫狁，至於大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侯誰在矣？張仲孝友。」³⁰

這首詩還原了這樣一件史事本末：時維六月，周軍戎服整畢，日行三十里，在周王詔令下遠征。因為北方少數民族獫狁來勢洶洶，侵佔焦獲（今陝西涇陽縣北），又攻打鎬（通「鄗」，非周都鎬京）與朔方，進犯涇陽。周軍討伐獫狁到了大原（即太原，非今山西太原），大捷後從鎬返回。回朝慶功宴上，周宣王卿士張仲赫然在列。較之前舉〈出車〉一詩，同樣也是載錄征伐，³¹此詩不但披述敵方獫狁從焦獲、鎬、朔方步步侵逼涇陽，又側記我方行軍每日三十里、在尹吉甫率領下大敗獫狁於大原，最後功成自鎬而歸。足見其就時間、人物、路程、地點、情節各方面的紀行處理上越加細膩。

綜觀這些《詩經》中涉及行旅文字的詩篇，雖然後世注家對個中內容理解存在分歧，³²但征戰、行役是最主要的背景。例如，除了普遍認為〈出其東門〉是譜寫男子對

²⁹ 同前註，頁 244-246。

³⁰ 同前註，頁 263-264。

³¹ 《漢書·韋賢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漢書·匈奴傳上》：「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班固：《漢書》卷 73、94（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3125、3744。

³² 例如〈出車〉一詩，《毛詩序》：「〈出車〉，勞還率也。」《箋》：「遣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詩三家義集疏》：「魯說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荊蠻。』」見周振甫：《詩經譯注》，同註 22，頁 247。而程俊英則認為：「這是一位出征的武士凱旋歸來賦的詩。舊說是慰勞南仲還師之作，不確。」見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61。

心儀女子忠貞不二的愛戀、³³〈蟲草〉是描寫思婦怨女之兒女之情、³⁴〈北山〉是宣洩士子對勞役分配不公的憤懣之外，³⁵廣泛視〈何草不黃〉為吐露征夫行役之苦、³⁶〈六月〉為述說周宣王北伐獫狁，告捷勞還、³⁷〈東山〉為記載士兵東征三年而返，於途中及抵家所見、³⁸〈出車〉為歌頌武士凱旋，周宣王平夷戰功、³⁹〈陟岵〉為體現征人思家懷歸。⁴⁰ 由此可見，紀行賦最早的取材來源與征戰、行役活動密不可分。不過，《詩經》帶來的影響或也僅止於此，它侷限地表現在其中有關來去地點的文字以及征伐行役背景對早期紀行文學的啓蒙意義。

三、《楚辭》中的紀行要素

首先，最早期的紀行賦繼承了〈離騷〉述士不遇、自傷放逐的情感主題。⁴¹茲援引其中章節來論證：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恫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⁴²

³³ 程俊英：《詩經譯注》，同前註，頁 137。

³⁴ 同前註，頁 20。

³⁵ 同前註，頁 349。

³⁶ 同前註，頁 404。

³⁷ 清人姚際恒說：「小序謂『宣王北伐』，是篇中『王於出征』乃王親征；鄭氏以『於』訓『曰』，非也。『以佐天子』，言吉甫佐天子也。但此篇則係吉甫有功而歸，燕飲諸友，詩人美之而作也。」見〔清〕姚際恒：《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 189。

³⁸ 高亨註：《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08。

³⁹ 周振甫譯註：《詩經譯注》，同註 22，頁 244-246。

⁴⁰ 程俊英：《詩經譯注》，同註 32，頁 162。

⁴¹ 關於〈離騷〉所代表的「士不遇」主題的形成，參看 Hellmut Wilhelm, "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310-319, 398-403. 以及顏昆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209-253。

⁴²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1-25。

從引文可見作者強調舉世渾濁、眾人逢迎的時風之下自己依然保持獨立不遷、志潔行廉，接着又重申屈心抑志、忍尤攘詬的信念。最後還流露自己面折廷爭、耿介如故而見妒遭讒的孤獨和流離失所、時不我與的感傷。〈離騷〉全文回環複沓了這種心聲。其中「傷」、「鬱邑」、「獨窮困」、「哀」等悲痛字眼怵目驚心，「寧溘死」、「不吾知」、「不忍」等糾結情緒歷歷可辨，「歔歔」、「掩涕」等愴然神態催人淚下，凡此種種，給後世紀行賦家提供了豐富的語彙資源，並在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重組或演繹。

43

這些關鍵詞串聯成一種不遇和傷別的情感基調，在其它《楚辭》篇章中也屢見不鮮。⁴⁴如〈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瑩瑩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涉青雲以泛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⁴⁵世俗迫阨濁穢，作者寧願夜不能寐、輕舉遠遊來托怨消愁，怎奈去國離鄉之痛和時不再來之恨在心頭無計可消除。此悲情特質終在〈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的這段渡沅水湘江向湖南進發到帝舜跟前訴說的放逐之旅中顯露無遺，也被早期紀行賦的作家們所祖述追惜。譬如劉歆於〈遂初賦〉中所述：「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矐世兮，自命已之取患。……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綿。」⁴⁶劉歆愴悴屈原志美行厲卻不容於世，暗示自己因懷才不遇而被迫踏上了漫漫貶逐長路。

再如馮衍在〈顯志賦〉的自論中就提及：「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⁴⁷這番自述先剖陳澹泊中正的心跡，接着嗟嘆雄才大略未得賞識，沉淪下僚抱憾此身。賦首又云：

⁴³ 例如，劉歆〈遂初賦〉曰：「哀哀周之失權兮。……過下虜而嘆息兮。」班彪〈北征賦〉曰：「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心愴恨以傷懷。……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沾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蔡邕〈述行賦〉曰：「心鬱悒而憤思。……哀哀周之多故兮。」

⁴⁴ Paul W. Kroll, "On 'Far Roam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4 (Dec. 1996), pp.653-669.

⁴⁵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 42，頁 163、172。按〈遠遊〉的歸屬仍存爭議，意見大致可分兩種。第一種以東漢王逸等為代表，力主屈原所作說，此說成為自漢至清約千年的主流觀點；第二種以清代胡濬源等為代表，力主漢人擬作說，近世廖平又對舉〈遠遊〉與〈大人賦〉，影響到後來疑古論者持司馬相如所作說。但較近時間段內反駁第二種觀點、迴歸第一種觀點的聲音愈加強烈，且論據更為充分，以陳子展《楚辭直解》、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姜昆武和徐漢澍《遠遊真偽辨》等為代表。本文姑從第一種說。

⁴⁶ [宋]章樵注：《古文苑》（臺北：鼎文書局，1973）卷 2，頁 13a-13b。

⁴⁷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28 下，頁 985。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我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蠹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惠？……行動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⁴⁸

在甲子日的春天中，馮衍從新豐（位於今西安市臨潼區）啓程奔赴西邊的鎬京（位於今西安市長安區），在鎬京這個中途站暫作徘徊。於旅程初始，他就開宗明義地道出，是在上者的喜怒無常、剛愎自用才導致了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悲情人生，亦是促成他這次遠行的直接緣由。長安飛廉觀、平陽縣的途中，他以行吟追憫屈原為契機，表達忿世嫉俗、疾惡如仇的心態。在過往與未來的歷史當口徘徊躑躅，仍不忘心繫故土，怎奈拳拳之心無由上達。正如蘇瑞隆所說：「作者指出時俗的險惡，無疑是繼承〈離騷〉的母題（motif）」，「將那種深沉的哀怨生動地表達出來」，因而「深得騷體之致」。⁴⁹〈離騷〉母題的形成同時也是其被經典化的過程，如鄭毓瑜文中所述：

「經典化」（canonization）的文本，一方面呈顯某種創作典式，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創作模式來指引閱讀、詮釋，乃至於引發一連串效騷命篇的模擬書寫。……「經典化」了的〈離騷〉，一方面成為固有的文化資產，一方面也隨時變遷，有著層積曲疊的歷史軌跡。後世模擬「放逐之旅」的作品，必然成為一張糾纏著個人心路、歷史記憶、家國想像、政治角力的存在版圖，而透過這些穿梭在古跡、今地，往昔、未來的種種時、空感知與詮釋，建構自己於「反放逐」的論述體系之中。⁵⁰

鄭氏以為，〈離騷〉這個經過時間積累下來的文學經典不但彰顯了「放逐之旅」的基調範式，而且在逐漸被後世文人認同、接受、重複、模擬的書寫過程中加入了作者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時代內容，所有這些構成了述士不遇、自傷放逐的作品體系。以劉歆、蔡邕代表的騷體紀行賦家，二人歷數了行經之地的見聞。劉歆的目的是紓解「公室由此遂卑」的隱憂、「為羣邪之所惡」的憤懣；蔡邕的目的是牽記「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嗟嘆「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

⁴⁸ 同前註，頁 988-999。

⁴⁹ 蘇瑞隆：〈世變時移下的紀行與述志：以馮衍『顯志賦』為中心的探討〉，同註 15，頁 149-150。

⁵⁰ 鄭毓瑜：〈歸反的回音——漢晉行旅賦的地理描述〉，同註 12，頁 143。

畿」。而對國家安危的掛慮、當下遭際的不平，此幾端正是屈騷中最常見的情感主題。⁵¹

其次，後世紀行賦取法了《楚辭》有關結合去國離鄉的具體行程敘述、在地心情記錄的表現手法。⁵²就取法的層次而言，由淺入深又可分為兩方面。

(一) 句式的借鏡

表 1 句式對比舉隅

作品	句型 A： 朝發 a 地，夕至 b 地	句型 B： 將去某地	句型 C： 止息某地
〈離騷〉 ⁵³	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乎縣圃。	忽反顧以遊目兮， 將往觀乎四荒。	步余馬於蘭皋兮， 馳椒丘且焉止息。
〈遠遊〉 ⁵⁴	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於微閭。	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	順凱風以從遊兮， 至南巢而壹息。
〈北征賦〉	朝發軔於長都兮， 夕宿瓠谷之玄宮。	遂舒節以遠逝兮， 指安定以為期。	乘陵崗以登降， 息邠邠之邑鄉。 ⁵⁵

參照上舉《楚辭》語境，迢迢萬里只在夙夜之間，凸顯了行程的緊湊和地點的頻變。⁵⁶如〈離騷〉中作者早晨從南方的蒼梧出發，傍晚就到達了昆侖山上。同時借草木零落、美人遲暮來比興，更給人以韶華易逝、一去不返之感。然則在緊張的行程中，仍有短暫的停頓省思，以作過渡。如〈離騷〉中作者在漢北躑躅縱目後，再遠赴四方荒原。對應在漢代紀行賦作品中，多處可見時序迴轉，物候推移，這些飽含朝夕、歲時意識的句子同樣也強調了事往日遷、時不我待的惶惶焦慮。如〈北征賦〉中作者早晨從長安出發，傍晚就疾馳到了長安西邊瓠谷的玄宮。而在匆促的路途中，停駐在雲陽縣（位於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城門口止步回首，爾後於邠邠的村落中稍作歇息，在逗留期間又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⁵¹ 王德華：《唐前辭賦類型化特徵與辭賦分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9。

⁵² 程章燦比照紀行賦的《詩》、《騷》二源時提到：「紀行賦遠源在《楚辭》，尤其在〈離騷〉、〈遠遊〉。〈遠遊〉在『縱遊上下四方之極際』中，展露內心情思，正是紀行賦的典型寫法。……《詩經》中描寫行役征旅的詩如〈小雅·採芣〉、〈豳風·東山〉，也可能給賦家以啓發，但影響不如《楚辭》顯著、直接。見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同註 20，頁 180。

⁵³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 42，頁 16-18，26。

⁵⁴ 同前註，頁 166，169-170。

⁵⁵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同註 7，卷 9，頁 426。

⁵⁶ 明人汪瑗曰：「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順流舟行之速也。」見[明]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167。

(二) 書寫方式的仿效

〈離騷〉之外的《楚辭》其它篇章，譬如〈九章〉普遍被視為是反映屈原被逐楚國南部經歷的系列作品，⁵⁷其中〈涉江〉一文記錄了屈原從今武昌地區展開的一段沿沅水而上的跋涉足印：⁵⁸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激浦余儵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⁵⁹

這段文字先敷陳秋冬時季，作者從湖北鄂州澤畔水陸兼程至今湖南常德、辰溪、激浦，順帶插敘了沅水流域的山川風貌。這是典型的後世紀行賦交待人物、時間、地點的行程表述手法。正如清人胡文英（生卒年不詳）《屈騷指掌》指出：「〈涉江〉篇，由今湖北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後人述征紀行之作也。」⁶⁰除了述序行旅之外，作者還論列世態人情，用「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來體現「寧甘愁苦以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⁶¹的抗志高遠。

此外，〈哀郢〉一文則描寫了屈原從郢都離開東行到陵陽的流亡路徑：⁶²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

⁵⁷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曰：「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 42，頁 120-121。除洪興祖本人外，明王夫之《楚辭通釋》、清劉夢鵬《屈子章句》、今人湯炳正《屈賦新探九章時地管見》和《楚辭今注》皆主此說。

⁵⁸ 清人蔣驥說：「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都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激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見〔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頁 117。

⁵⁹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 42，頁 129-130。

⁶⁰ 〔清〕胡文英：《屈騷指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卷 3，頁 119。

⁶¹ 〔明〕汪瑗：《楚辭集解》，同註 56，頁 163。

⁶² 清人戴震《屈原賦注·音義下》云：「屈原東遷，疑即當頃襄元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取析十五城而去。時懷王辱於秦，兵敗地喪，民散相失，故有『皇天不純命』之語。」見〔清〕戴震著，張岱年主編：《戴震全集》（黃山：黃山書社，1995），冊 3，頁 779。

兮，今逍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淼南渡之焉如？⁶³

〈哀郢〉與〈涉江〉在表現手法上也如出一轍，先把仲春甲日清晨郢都離別、船過夏浦、順風東下、隨波逐流，上溯洞庭、下遊長江的行程形諸筆墨。中間絮說回望不見郢都東城門龍門，而頓覺前路渺遠和抵達陵陽、南渡大江後，困厄不知歸去何方的流寓途中的鬱結情思。

這兩篇〈九章〉作品不但將作者的流離播遷過程鋪采摛文，還把壓抑的憂愁苦悶頻頻地抒發在寓目的山形地勢和聯想到的故俗遺風中。清人陳本禮（1739-1818）對此有段箋論：

屈子之文如〈離騷〉、〈九歌〉章法奇特，辭旨幽深，讀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俟徑更幽，非〈離騷〉、〈九歌〉比。蓋〈離騷〉、〈九歌〉猶然比興體，〈九章〉則直賦其事，而淒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朱子淺視，譏其直致無潤色，而不知其由蠶叢鳥道巉巖絕壁而出，耳邊但聞聲聲杜宇啼血於空山夜月間也。⁶⁴

陳本禮感嘆〈離騷〉等篇已然結構複雜、題旨幽深，然〈九章〉取徑更有特色，蓋因其直接鋪陳敘事，淒入肝脾，在山川輾轉之中更縈繞了作者的情感線索。後世紀行賦的雛型即直接導源於《楚辭》中牽涉放逐流寓的篇章，而相較〈離騷〉和〈遠遊〉，〈九章〉中的〈涉江〉和〈哀郢〉帶有更強的對行跡旅程和心路歷程的紀實性，因而對紀行賦的意義更為深遠，誠為其之「濫觴」。⁶⁵

四、紀行賦在漢初的醞釀

前述〈涉江〉和〈哀郢〉諸篇在記述具體實際行程的技藝上已是匠心初顯，但在行經地點至多只有觸景生情的感喟，而無對其地作出任何具有歷史意義的評論。最早在文中用歷史眼光觀照一個真實地點的兩位作者是賈誼（200-168B.C.）和稍後的司馬相如（179-117 B.C.）。

⁶³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42，頁132-135。

⁶⁴ [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揚州：廣陵書社，2003），頁10439。

⁶⁵ 葉幼明：《辭賦通論》，同註12，頁97-98。

生活在西漢初年的賈誼曾寫過一篇〈弔屈原賦〉，作於漢文帝四年（176B.C.）在赴任長沙王吳差（177-157B.C.在位）太傅途中橫渡湘水前後。⁶⁶此處是否為當年屈原自沉汨羅之地確切地點賈誼並未加以說明，但湘水正是汨羅的幹流，賈誼借機追愍屈原，因以自傷。⁶⁷正文又曰：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梟翱翔。闖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諱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⁶⁸

賈誼自稱以待罪之身接受文帝委任，憑弔同樣也「遭世罔極」和「逢時不祥」的屈原。賈誼接着用一連串靈鳥伏竄、惡獸橫行的譬喻來對應賢聖罹禍、小人得志的世態人情。然後再用一組歷史人物對比，即商代賢士卞隨、伯夷被世人毀棄；而春秋魯國大盜跖、戰國楚叛將莊躄反被世人褒揚的倒行逆施來宣洩抑鬱不平。末尾「諱曰」一段相當於《楚辭》中常見的用來卒章顯志的「亂辭」，慨嘆自隕，哀感頑豔。

宋尚齋評論此賦道：「雖主要是抒情而非紀行，但在旅途中憑弔先賢、抒發感慨，對後來紀行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⁶⁹賈誼擇取從京都長安譴謫長沙必經之途的一段——渡湘水前的場境來摭議古今，雖然他並沒有將整段行程敷陳備細，但卻已然出現了紀行賦頻用的以憑弔古跡來感時傷事的表現手法。只不過這篇賦所述僅限於一地，而後世紀行賦則會將諸多所經之地的民情掌故根據行程來綴緝成篇。

還有一則典例，是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在這篇騷賦裏，他記敘了漢武帝到位於雍州萬年縣（今陝西西安附近）西南宜春苑中的秦二世陵的一次巡遊。⁷⁰康達維認為「此賦把敘述限於單一的地點，因此從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一篇對旅行見聞的記錄」，但至少它是「最早在賦中對一個歷史地點加以評論」的案例。⁷¹其實賈誼的〈弔屈原賦〉較之更早針對一個歷史遺跡進行撫今追昔，但相如的這篇賦無論在地點或是行程上，其準確具體性顯然加深了，體現如下：

⁶⁶ [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84，頁2492。

⁶⁷ [漢]班固：《漢書·賈誼傳》，同註31，卷48，頁2222。

⁶⁸ 同前註，頁2223-2224。文字略有出入的版本可見[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同註66，卷84，頁2493。

⁶⁹ 宋尚齋：〈漢魏六朝紀行賦的形成與發展〉，《文史哲》第5期（1990），頁69-71。

⁷⁰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同註66，卷117，頁3054-3055。

⁷¹ 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pp.157-172.

登陴之長阪兮，窅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隴州兮，望南山之參差。⁷²

作者開頭就列述攀登斜坡並進入層疊的秦離宮、迎長安東南的曲江岸遠眺錯落終南的行程。緊接着他描述了眼前山峰聳峙、林谷空寂和水流湍急、平阜眇莽的景象：

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豁兮豁瀾。汨減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⁷³

然後策馬東進，途經二世墓左右的土山；涉水北往，趟過砂石上的激流漩渦，最後束馬緩行，來到二世墓前徘徊憑弔：

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哀哉！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⁷⁴

駐足在秦二世胡亥（230-207B.C.）被趙高之女婿閻樂弑殺之地，前鑒既明，后復申之，司馬相如借題發揮，告誡漢武帝勿蹈覆轍。這篇賦的產生背景與相如另一篇作品〈諫獵書〉的由來類似。⁷⁵他先陪侍武帝至長楊宮（今陝西周至東南）遊獵，見漢武帝「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故當書諫諷喻這種「非天子所以宜近」的行徑。⁷⁶在此事件之後，相如復過宜春宮，繼續援古刺今，箴戒得失。只不過這篇賦將整個行程中的一個片段申紓得更加細緻明曉。相如不僅述其行跡，繪其時景，還即景言情，因時生感，以致君臣教化與治亂興衰也興到筆隨。當時相如是獨自或是陪同武帝巡遊宜春宮現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這前後兩次出行是產生〈哀秦二世賦〉的外部先決條件。

上述兩例可以證明兩個問題。第一，賦體文學內部自身存在着襲凡蹈故的傳統，正如劉勰所說：「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⁷⁷它表現在賦體文學對《楚辭》怨刺憤懣精神的承繼、楚地方言的模數、吊古主題的延續。〈弔屈原賦〉和〈哀秦二世賦〉在形式上都採用《楚辭》句式，在題材上均選擇吊古傷今。第二，文本外部的其它因素徑直或迂迴對作家作品產生影響。貶謫他鄉是促成作者行程的前提事件，如果沒有屈原和賈誼兩次貶謫

⁷²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同註 66，卷 117，頁 3055。

⁷³ 同前註，頁 3055；[漢]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同註 31，卷 57，頁 2591。

⁷⁴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同註 66，卷 117，頁 3055。

⁷⁵ [漢]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139。

⁷⁶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同註 66，卷 117，頁 3053。

⁷⁷ [南朝梁]劉勰：〈時序〉，見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9，頁 1677。

之途交匯點的巧合，〈弔屈原賦〉也無被後世諷翫的可能。而若不是漢代賦家很多曾有身為文學侍從之臣的經歷，因而「常隨帝王遊獵、出巡，遊覽名山大川」，賦中才平添紀行成分，如〈哀秦二世賦〉以及後來「揚雄的〈甘泉〉、〈河東〉」二賦。⁷⁸

五、西漢末紀行賦的創立和紀行文學的成熟

如果說〈離騷〉多還是「個人恢奇浪漫的想像」，〈涉江〉、〈哀郢〉亦非「立意『紀行』」，〈弔屈原賦〉和〈哀二世賦〉缺乏「行程變化要素」，⁷⁹那麼西漢劉歆的〈遂初賦〉則正式將先前那些作品中靈光乍現的紀行成份從輕描淡寫轉變為濃墨重彩。雖然劉歆並不以此賦顯名，它在紀行賦傳統形成中的地位卻是舉足輕重的。

（一）作者生平與寫作背景

劉歆出身自儒學世家、劉漢宗室。成帝河平三年（26B.C.），與父劉向（ca.77-6B.C.）一起奉旨領校內秘府藏書，對儒家各經、諸子學說、詩賦數術無所不究。劉向於哀帝建平元年（6B.C.）去世。⁸⁰是時大權旁落在外戚大司馬王莽（45B.C.-23A.D.）手中。王莽深諳其德才，遂舉薦其任侍中太中大夫，後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可謂一時顯貴。劉歆得以復講《五經》，卒父之業。在校勘皇家典籍過程中，劉歆發現了古文《左傳》，他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同心合意，因而深得《春秋》之旨，便以《左傳》解《春秋》，自成一家之說，後來甚至提議將之納入學官，與《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同置並列。⁸¹在向五經博士闡述《左傳》大義的過程中，劉歆遭到眾博士的強烈抵觸，劉歆寫下〈移讓太常博士書〉一文，對反對者們指摘甚切，自然得罪了諸儒。大司空師丹（d.3A.D.）上奏彈劾劉歆煽惑人心、悖離宗法，哀帝卻出言維護劉歆，加劇了劉歆在朝中人際關係的惡化。他憂讒畏譏，尋求出補，初調為河內太守，因其身為宗室成員循例不當鎮守三河地區，故再遷五原。⁸²以上是劉歆赴職五原和〈遂初〉一賦創作之前的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

⁷⁸ 宋尚齋：〈漢魏六朝紀行賦的形成與發展〉，同註 69，頁 69-71。

⁷⁹ 劉楚荊：《蔡邕辭賦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8），頁 28。

⁸⁰ 劉向傳記可參〔漢〕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同註 31，卷 36，頁 1928-1966。

⁸¹ 同前註，頁 1928、1966-1967。

⁸² 〔漢〕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同註 31，卷 36，頁 1966-1972。

(二) 內容主旨與結構佈局

1、緒論動機

劉歆〈遂初賦〉之「遂初」可等同作「邃初」解，原意為「先前」。到了東漢蔡邕〈協初婚賦〉言：「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網紀」（一本作「邃初」）⁸³，「遂初」含義依然如故，但後作刻意引申，化用了「順其素志」也即個人原初志向的意涵，這被崔篆（ca.25B.C.前後在世）〈慰志賦〉最早襲用。雖然〈遂初賦〉全文的傳播晚於劉歆的生活年代，⁸⁴而且賦序也顯然是後人添加，⁸⁵但賦文的真實性卻是確鑿不移的。⁸⁶賦前所繫序言如下：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征事。而寄己意。⁸⁷

此段文字雖非劉歆親筆所寫，但也分明地道出了生成此賦的來因去果、題旨語境。首先，起因在於劉歆好《左傳》而欲將其列入漢代所設學校教學框架內，觸怒了儒官耆舊，被排擠出朝。因劉歆的皇室宗親身份按舊制不宜擔任河內、河東、河南三郡太守，故從本來出守河內一職遷任五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太守。其次，正是這次北徙過程，得以讓劉歆從河內（今河南沁陽）途經晉國故地，觸目睹物之間不禁撫景傷情，因而以「感今思古」為表現形式，並以「寄歎征事己意」作主題內容。

⁸³ [漢]蔡邕：〈協初婚賦〉，見鄧安生編：《蔡邕集編年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441。

⁸⁴ 此賦今可見的最早文本應是《藝文類聚》版，[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27，頁490。《岱南閣叢書》所收《古文苑》中的此賦版本略為不同，相較前者，其序言更長，且正文有所缺漏。[漢]劉歆：〈遂初賦〉，見[清]孫星衍輯：《岱南閣叢書二十種》（上海：博古齋，1924，《岱南閣叢書》影印[清]孫氏刻本）卷2，頁11a-14b。而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和潘岳〈西征賦〉三篇全文卻更早就出現在了梁蕭統編撰的《文選》之中，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10，同註7，卷9頁425-439。

⁸⁵ 此賦的序言大多複述了《漢書·楚元王傳》中的原文，見[漢]班固：《漢書》，同註31，卷36，頁1967。

⁸⁶ 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pp.1-23.

⁸⁷ [宋]章樵注：《古文苑》，卷2，同註46，頁11a-11b。

2、次申隱情

正文開始，劉歆先敘述其為官蹤跡與人生心路：

昔遂初之顯祿兮，閭闔之開通。躋三臺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備列宿於鉤陳兮，擁大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闕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數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⁸⁸

這一段先借一系列天文星象對應朝中官職，如「三臺」共六星，位在北斗星的魁、杓之下，分三行，每行二星，各兩星相比而斜上，以其臺階之狀有如天子至臣民的階級一樣指稱「三臺」。對應西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西漢末三公又分別對應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⁸⁹因劉歆與父劉向曾領校皇家圖書祕籍，歸大司空屬官管轄，故自謂「躋三臺」。「北辰」與「紫宮」分別象徵天子和朝堂，借指劉歆曾先後被拔擢為侍中、太中大夫、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等朝中顯職。「三臺」從星象銜接到官職，用來暗喻劉歆之前的仕宦之路。起初的順遂平穩形勢突變，他又舉述日月星辰的分佈運行之變：「太階」即前文中的「三臺」上下各附的兩顆星，⁹⁰「機、衡」北斗七星之中的第三、第五顆，以及「魁、杓」北斗七星之中的第一至第四、第五至第七顆皆紊亂無序，它們的變動不居也隱示了宇宙的樞紐——中央朝政的失其常道，也即哀帝時期三公專擅威柄，兇恣日積。⁹¹所以這些文字實則是以曲筆吐露這次走馬離任的內情。他擬應以「河濱」即河內為歸宿，然迫於水神陽侯的洶湧波濤，只能改弦易轍。最終在得到北方主神「玄武」的兆示下，他前去五原。

3、備載歷程、記省往鑒

在上一段有關仕途和遷謫的原委始末的伏筆之後，劉歆正式開啟了溘死流亡之路：

⁸⁸ 同前註，卷2，頁11b。

⁸⁹ [漢]劉歆：〈遂初賦〉，見龔克昌等評注：《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頁422-423。

⁹⁰ 上臺、中臺、下臺各二星，相比而斜上，如階級然，故名。揚雄〈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同註7，卷9，頁407；李善注：「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見《文選》卷6，頁288。

⁹¹ Ho Peng Yoke trans.,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Chin Shu*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1), p.72, pp. 80-81, 94-98.

……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隆兮，馬龍騰以超攄。無雙駟以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吊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驚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於途吾。過下虜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情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族閔其無人。曰不爨而俞甚兮，政委棄於家門。⁹²

他先穿越險隘難行的太行之巔，後逐步進入原本晉國的腹地。「黎」、「高都」都是在今山西境內的古國名，在春秋時期均隸屬晉國。⁹³所經之地的行色風煙折射給劉歆的是歷史的浮光掠影。在這些地點，他聯想到，大將趙括（d.260B.C.）曾率趙軍在公元前260年殊死抵抗秦軍，但全軍覆沒於長平（今山西高平南）；⁹⁴周文王（1152-1056B.C.）禮賢下士，人心所向，一批賢才如辛甲前來歸附。⁹⁵晉軍又在公元前557年於長子（今山西長子西南）和屯留（今山西屯留東南）分別活捉衛將孫蒯與石買，作為對孫、石二人在前一年領兵伐曹時佔領重丘（今山東鉅野西南）行為的懲罰。⁹⁶而在之前的公元前590年，也正是因為晉公遣使磋商周室和戎的和談，周王幼子劉康公誤判形勢，欲借機征討茅戎（活動於今河南三門峽市），導致周軍潰敗於徐吾（茅戎一支，活動區域主要在屯留西北），⁹⁷這樣晉國「解救王師」就頗富反諷意味。晉平公連續做了一些有失民心、不合宗法的舉措，先是在公元前534年在虜祁（今山西侯馬市西南）大興土木，以廣其第。⁹⁸後又在公元前544年，吞併杞國，並命諸侯大夫修築杞國城防。終於導致眾叛親離，人怨沸騰，劉歆直接援引了春秋時期的一些貴族公卿之言，如子大叔（d.507B.C.）曾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即杞國）是屏。」⁹⁹叔向（?-ca.528B.C.）也歎曰：「政在家門，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¹⁰⁰劉歆在上述一節裏，對他駐足

⁹²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46，卷2，頁12a-12b。

⁹³ [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卷2，頁92。

⁹⁴ [漢]司馬遷：《史記·趙世家》，同註66，卷43，頁1826；《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卷81，頁2446-2447。

⁹⁵ 辛甲本為商紂王之臣，進諫紂王達七十五次卻不被接納，最後轉事周文王。文王封他於長子，本事可見[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同前註，卷4，頁116；[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同註31，卷28上，頁1553；《漢書·藝文志》，同註31，卷30，頁1729。

⁹⁶ [春秋]左丘明：《左傳·襄公17-18年》，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029-1035。

⁹⁷ [春秋]左丘明：《左傳·成西元年》，同前註，頁782-783。

⁹⁸ [春秋]左丘明：《左傳·昭公8年》，同前註，頁1300。

⁹⁹ [春秋]左丘明：《左傳·襄公29年》，同前註，頁1158。

¹⁰⁰ [春秋]左丘明：《左傳·昭公3年》，同前註，頁1237。

的那片土地之上曾經發生過的治亂存亡、厲害興廢多所發明。那麼他的觀之上古、備詳前事是否用來驗之當世、參以人事的用意呢？作者表述如下：

載約屢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為履。……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靈美不必為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賈兮，嗟千載其焉合。¹⁰¹

由於晉平公為政昏聩，冠履倒易，卒致其玄孫——晉國末世君主靖公（377-376B.C.在位）在公元前 376 年被晉國六卿中的三個貴族——趙、魏、韓所逼宮退位。¹⁰²劉歆在銅鞮（今山西沁源西北）回想靖公之下場歷歷在目，這段追憶不止在就事論事，或苟徇私忿，真實用意正如章樵注釋所言：「歎宗周衰微，晉平不能嗣伯業，以尊周室，卒致晉公室卑為三卿所滅，其傷漢之心切矣。」¹⁰³劉歆再現晉世嬖臣僭竊君柄的史事，是欲將其作為龜鑑，隱射他身處的漢室危機。往下地點又繼續推移，劉歆越過侯田（位於今河南武陟南），他念茲在茲的是晉太傅叔向身陷囹圄，幸賴已致仕太原的大夫祁奚力說當時的權臣士匄將其釋放的故事來歷，¹⁰⁴並為叔向鳴不平道：「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群邪之所惡？」劉歆對叔向披肝瀝膽卻橫遭讒陷的同情和義憤，既是對屈原「何瓊佩之偃蹇兮，眾夔然而蔽之」¹⁰⁵慨息的共鳴，更是對叔向身世的自譬和移情，而即便是叔向的結局，劉歆也不可企及，因為他沒有如祁奚這樣的前輩出來替他伸張正義。作者繼續追昔撫今道：

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蔡陳。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犇兮，豈材知之不足。揚鬢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矐世兮，自命己之取患。¹⁰⁶

¹⁰¹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2b-13a。

¹⁰² [漢]司馬遷：《史記·晉世家》，同註 66，卷 39，頁 1687。

¹⁰³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2b-13a。

¹⁰⁴ 西元前 552 年，士匄囚禁了叔向，並處斬了其弟羊舌虎及其他九個晉國貴族。〔春秋〕左丘明：《左傳·襄公 21 年》，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同註 96，頁 1059。

¹⁰⁵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註 42，頁 39-40。

¹⁰⁶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3a-13b。

和〈離騷〉中一些先陳小人、後述君子的臧否歷史的套路相似，〈遂初賦〉也在回顧晉國由盛轉衰的頹變中鞭撻了一批黨附君親、方正倒植的人倫時風之後，引發對忠良的無限同情：淑聖如孔子者，卻困厄陳蔡；貞專如屈原者，卻自沉汨羅；方直如柳下惠者，卻三遭罷黜；賢能如蘧瑗者，卻受抑離國。賢、庸兩組人物的境遇反差之大更激發了劉歆的疑惑不解，以至於他要反問上述諸賢，以他們的博聞多識，何以落得如此下場？霎時間他將目光轉視當下，嗟怨時運不濟的現實，這是全賦之中寥寥無幾的直陳時政之處。接下來他又返回並陷入歷史的沉思：

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既在皂隸兮，六卿興而為桀。荀寅肆而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¹⁰⁷

這一段劉歆回顧了公元前五世紀末的一幕幕晉國國殤。在晉昭公（d.526B.C.）在位時顯赫一時的六大貴族韓、趙、魏、范、智、中行六氏權傾國君，互為攻訐，競相逐伐。在晉國政壇叱咤半世紀有餘的正卿趙鞅（d.475B.C.）被其中的中行文子荀寅及其婿范吉射所敗而逃亡至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¹⁰⁸也以此地為行程的轉捩點，劉歆踏上了繼續北上五原的跋山涉水之路：

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遙思兮，垂意兮邊都。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曠兮，沙埃起之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蒹谿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颭悽愴以慘怛兮，憾風謬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鳥脅翼之浚浚。山蕭瑟以鷓鳴兮，樹林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忽急兮，石捌破之崑崑。天烈烈以歷高兮，廖琤窻以梟牢。雁邕邕以遲遲兮，野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¹⁰⁹

他先是平鋪直敘了一系列行程：穿越晉陽以南的中原地帶，攀登位於今山西代縣之北的句注山，接而連過雁門（今大同以西）和雲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南）兩郡，後抵臨沃（漢五原郡縣名，今內蒙古包頭西）。此地距他赴任的五原郡治所已不遠，似乎他有意稍作駐足，用「遙思」和「垂意」兩個動作來關注周遭和遐想過往。他首入眼簾的是一片靜止肅殺之景：蹊隧險絕的束馬之谷和遼遠無際的無人之鄉，凌冽迴旋的寒風和遮天

¹⁰⁷ 同前註。

¹⁰⁸ 分別見〔春秋〕左丘明：〈左傳·定公 13 年〉、〈左傳·哀公 3 年〉、〈左傳·哀公 5 年〉，見楊伯峻註：《春秋左傳注》，同註 96，頁 1588、1622-1623、1629-1630；又見〔漢〕司馬遷：《史記·趙世家》，同註 66，卷 43，頁 1789-1792。

¹⁰⁹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3a-13b。

蔽日的沙塵，凝噎枯涸的河川和靄靄覆野的荒原。然後他又察覺到了靜中有動的物象和音響：江河解凍導致的水流激撞，氣旋驟起引出的風聲哀切，還有鳥獸逃竄，草木搖落，山崩石裂……總之他所經目過耳的鄂爾多斯草原是一派淒風楚雨、胡雁啁啾之地。康達維認為劉歆把北上五原的行程呈現的如此艱難是有影射其一波三折的仕途之現實用意的。¹¹⁰站在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邊疆口哨，劉歆頓覺前程漫漫難測，而回望已去國遙遠，不由思歸懷鄉。突然他又聯想到了曾活躍於該地的一些人事：

迴百里之無家兮，路修遠而綿綿。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¹¹¹

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325-299B.C.在位）和大將趙奢（270B.C.前後在世）都曾在此留下足跡。趙武靈王力排眾議施行「胡服騎射」終致國富兵強，他曾於公元前 300 年率部攻打中山，北拓燕、代領域，西進雲中、九原（漢屬五原郡，今包頭西）地帶。¹¹²秦軍曾在公元前 270 年包圍趙國邊鎮閼與（今山西和順），趙奢先在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駐守，並修築工事使得城池固若金湯，後乘秦軍懈怠間隙施以奇襲，一解閼與之圍。¹¹³劉歆顯然對這兩位君臣攘外安內的政績很是心服首肯。

4、靜心明志、慰情勝無

全賦文勢在末章突然急轉直下：

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竺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漠兮，居華體之冥冥。玩琴書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懽娛兮，固賢聖之所喜。¹¹⁴

劉歆筆鋒一轉，談及身處的陬邑僻壤唯地凍天寒難耐外，其它環境因素都不足懼。相反，在此深居之中他能夠清神靜，復返自然。加上把翫琴書、探究天地來消愁解憂，足已做到外慾消弭，內心澄淨。他一連引用了多個道家理念，例如「寂寞」與「恬淡」就源出於《莊子·天道》中的「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萬物

¹¹⁰ 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pp.157-172.

¹¹¹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3b-14a。

¹¹² [漢]司馬遷：《史記·趙世家》，同註 66，卷 43，頁 1806-1810。

¹¹³ [漢]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同前註，卷 81，頁 2445。

¹¹⁴ [宋]章樵注：《古文苑》，同註 46，卷 2，頁 14a-14b。

之本也。」¹¹⁵在此處，劉歆之前充溢着的自嗟淪落之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樂天知命和消極無為。尾綴的亂辭也無隻字提及餘生憂患：

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
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
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¹¹⁶

前面幾句劉歆依舊站在道家超然的視角看待寵辱、遷謫等人生或宦海的是非浮沉。他所追求的「品物齊兮的大人之度」，正是《莊子·齊物論》所立基的宇宙自然本身的運行之道，即天地造化無所拘限，因此應放棄人生或宦海無謂的絕對和堅持。劉歆表示自願安時處順，韜光晦跡。然而最後他又陡然以儒家教義來終結全賦，即先申明懷才抱德，不肯降志的重要，接着援引《論語·述而》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之句，¹¹⁷來立志學步老彭，宣揚獨善學術、潛修古文的立場。

（三）紀行賦的書寫機制

許結曾概論劉歆的〈遂初賦〉肇創了一套紀行賦的「固定的格式」，它被後世同類作品中的許多奉為程式並步趨效擬。¹¹⁸紀行賦的這套書寫機制，至少涵蓋四個有機組成部分，有必要在此作進一層闡發：

第一，「紀行」的線索是作者親歷的一段為期不短的地理位移和時序更迭。在〈遂初賦〉裏，僅是提到的轉換地就有：太行山、天井關、黎（殷商諸侯國，漢上黨郡壺關縣黎亭）、高都縣、長子（春秋晉國都邑，漢上黨郡治）、屯留（漢屬上黨郡）、余吾（晉國都邑，屯留西北）、下虜（漢屬上黨郡銅鞮縣）、銅鞮（今山西沁縣）、侯田（今河南武陟南）、太原、晉陽（漢太原郡治）、中國（晉陽以南的中原地帶）、句注山（即雁門山，今山西代縣西北）、雁門（漢郡，今山西北）、雲中（漢郡，今山西西北及內蒙古南）、臨沃（漢五原郡縣）、邊都（五原郡）這十八處之多。作者的見聞感想也是伴隨着這一幅幅從河內（今河南沁陽）漫遊晉國故地再北徙五原的行跡圖而轉換接續。

¹¹⁵ [清]郭慶藩撰，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5中，頁457。

¹¹⁶ [宋]章樵註：《古文苑》，同註46，卷2，頁14a-14b。

¹¹⁷ 楊伯峻譯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66。

¹¹⁸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同註14，頁169。

第二，「紀行」的筆法是作者將在途的行蹤以時空交織的縱、橫二維書寫。具體而言，涉及作者所經地之過去或現在的風貌，還有發生於該地的過去或現在的事件。前者側重描狀地景物候，後者頗見隸事用典，而用典案例又可細分為人典、事典、語典。劉歆歷經地域大致可分為晉國故地和五原周邊這兩大版塊。在入晉之初，他經目了眼前險隘的太行山和高峻的天井關，抵達古晉境內的黎、高都之後聯想回憶到了過往的人、事。關聯人物有曾在公元前 259 年抗秦失利、殞身長平的趙將趙括，在辛甲的封地長子留下聖智賢明、折節下士佳話的周文王；關聯事蹟有晉軍在公元前 557 年於長子和屯留分別活捉衛將孫蒯與石買，在公元前 534 年晉平公在虎祁大興土木，後又在公元前 544 年吞併杞國，終於導致眾叛親離，人怨沸騰；語典有春秋時的一些貴族公卿之言，如「背宗周而不卹兮」出自鄭國正卿子大叔之言，「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族闕其無人。……政委棄於家門」等句則是化用晉國上大夫叔向所云。在劉歆穿越晉陽以南的中原地帶之後，他自述是心懷激蕩地攀登了句注山，接而連過雁門和雲中兩郡，途經的是舟車不通、人跡罕至之地。在抵達五原之前的最後一站——臨沃之際，劉歆將滿目肅殺和過耳淒厲都呈諸筆端：沙塵蔽日，河川凝噎，靄靄覆野，鳥獸哀號，巨石崇竦，壁立千仞……移景之間，他遙睹邊塞的瞭望塔和烽火臺等工事，思緒又駢接到戰國的趙武靈王勵精圖治，曾拓地至此；大將趙奢也固守金城，大潰秦軍。所以，整個正文作者都是在地、史、時、空的交叉互動中起承轉合。通過這四個元素的組合，給讀者最直接的觀感衝擊是「變」與「不變」的矛盾輪回；或者節同時異，或者物是人非。但是通過對比，治亂興衰、賢明昏聩的反差就鮮明可見。在作者看似冷酷的陳說事過境遷和形容滄海桑田之間，他也注入了自己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腹誹。例如：「駑駘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過下虜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等句，字裡行間可以捕捉到言外之意，「慶」一字表達出作者為周史辛甲終獲明主賞識而備感欣慰，「哀」一字顯現出作者對周室式微而深深扼腕，「悲」一字透露出作者對平公荒淫無度的失望之極，「憐」、「唁」分別道出作者對出公（平公玄孫）、靖公喪失基業的無限同情。這些寓褒貶於隻字的《春秋》筆法還只是間接地用闊論歷史來旁敲側擊漢庭現狀，而在劉歆列述孔子困厄陳蔡、屈原放逐汨羅等不平之事後，他終於無所顧忌地一抒胸臆道：「空下時而矐世兮，自命己之取患」，宣洩了對當時朝政的不滿之情。

第三，「紀行」的結構是先陳起因、次申背景、再述行程、末表心志。〈遂初〉賦前介紹促成這次征途和作品原因的序言雖非作者本人所著，但在正文之前以小序交代原由的作法在之後的同類作品中數見不鮮。接下來，劉歆在正文初始即先用星辰運轉態勢來指涉自己的仕途始末，並曲筆點出當時朝政功能的失常和宗室身份的例外是他從河內改守五原的大背景。然後，他開始記錄從河內發端，行經晉國故地，止於五原邊塞的沿

途場景、掌故和心情，且基本忠實地貼照實際的行程。而在全文末尾，劉歆用一段四言騷體作結，以安身立命之道來明志。這一整套構章佈局也被後世作品因藉為常則。

第四，「紀行」的基調是一番淒風苦雨，蕭索難堪，但往往會在文末界限分明地轉成否極泰來，柳暗花明。在〈遂初賦〉內，一直到最後劉歆抵達五原之前的大部份篇章，呈現的氛圍多是宦海風波、世途機阱的憂懼，和背井離鄉、放臣逐子的幽怨，還有生不逢時、命途多舛的悲哀。但真到達五原之後，他又安貧守道，潛心滌慮起來，在收束的「亂辭」裏，作者更是全然消弭雜念，屏絕塵俗，篤志於無待外物、與道俱化的修養襟懷。正是基於上述四點，〈遂初賦〉方可稱之為「賦史上第一篇成熟的紀行賦」。

119

六、結語：紀行賦的書寫機制

後世紀行賦確實存在着模《詩》為式，效〈騷〉命篇的擬范現象，然兩者相較，紀行賦之於《詩經》僅止於竊其辭藻，模其篇目；而紀行賦之於《楚辭》則進益為博其手法，取其架構。換言之，《詩經》帶給紀行賦的啓蒙意義主要體現在提供有關徂徠地點的文字、標誌步馬馳車的篇名以及征伐行役的背景等紀行文學的基本要素；而《楚辭》施於紀行賦的借鑒價值則涵括了述士不遇、自傷放逐的抒情主題，以及行程記錄、途景鉤沉、歷史回憶、仙遊幻想的表現手法，還有烙印地域色彩的楚語風格等諸多方面。因而可以說《楚辭》無論從外在形式還是內容肌理上都實質性地開後世紀行賦之端。¹²⁰

兩漢之交，劉歆的〈遂初賦〉則奠定了紀行賦的一套書寫機制：

第一：「紀行」的線索是作者親身實歷的一段為期不短的地理位移和時序更迭。

第二：「紀行」的筆法是作者將在途的行蹤以時空交織的縱、橫二維書寫。

第三：「紀行」的結構是先陳起因、次申背景、再述行程、末表心志。

第四：「紀行」的基調是一番淒風苦雨，蕭索難堪，但往往會在文末界限分明地轉成否極泰來，柳暗花明。

正是基於上述四點，〈遂初賦〉方可稱之為賦史上第一篇成熟的紀行賦。經過帶有紀行成分的《詩經》、《楚辭》、漢初騷體賦漫長的層層遞進演化之後，到了〈遂初賦〉這裏，中國紀行文學才在真正意義上正式確立。

¹¹⁹ 卞孝萱、王琳：《兩漢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67。

¹²⁰ 程章燦持大致相似觀點曰：「《詩經》中描寫行役征旅的詩如〈小雅·採芣〉、〈豳風·東山〉，也可能給賦家以啓發，但影響不如《楚辭》顯著、直接。」見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同註20，頁180。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春秋〕左丘明著，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漢〕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漢〕蔡邕著，鄧安生編：《蔡邕集編年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章樵注：《古文苑》，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
- 〔明〕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清〕孫梅：《四六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 〔清〕胡文英：《屈騷指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
- 〔清〕戴震著，張岱年主編：《戴震全集》，黃山：黃山書社，1995年。
- 〔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 〔清〕郭慶藩撰，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 〔清〕姚際恒：《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清〕孫星衍輯：《岱南閣叢書二十種》《岱南閣叢書》影印〔清〕孫氏刻本，上海：博古齋，1924年。

二、近人論著

- 于浴賢：〈六朝紀行賦繁榮之鳥瞰〉，見周勳初等編：《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王琳：《六朝辭賦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王允亮：〈漢魏六朝紀行賦考論〉，《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2012年。

- 王思豪：〈『遂初賦』用《左傳》事典的學術史意義〉，《文學研究》第2期，2015年。
- 王德華：《唐前辭賦類型化特徵與辭賦分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卞孝萱、王琳：《兩漢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李炳海：〈《詩經》中的空間方位選析〉，《中州學刊》第3期，1991年。
- 宋尚齋：〈漢魏六朝紀行賦的形成與發展〉，《文史哲》第5期，1990年。
- 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沼口勝：〈馮衍の『顯志賦』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41號，1979年。
- 徐華：〈劉歆『遂初賦』的創作背景與賦史價值〉，《文學遺產》第2期，2013年。
- 高亨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張民權：〈《詩經》中的「東門」和「南山」〉，《文史知識》第2期，1995年。
- 彭春艷：〈劉歆『遂初賦』、『甘泉宮賦』作年新考〉，《蘭臺世界》第10期，2014年。
- 黃侃撰，黃焯編次：《文選評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葉幼明：《辭賦通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 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鄭毓瑜：〈歸反的回音——漢晉行旅賦的地理描述〉，見衣若芬、劉宛如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
- ：《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 劉師培：《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劉敏、李元旭：〈漢魏六朝紀行賦論略〉，《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2年。
- 劉楚荊：《蔡邕辭賦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
- 顏昆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 蘇慧霜：〈唐人祖述屈騷探微〉，《中國楚辭學》第3期，2009年。
- ：〈論屈原作品和騷體紀行賦〉，《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0年。
- 蘇瑞隆：〈世變時移下的紀行與述志：以馮衍『顯志賦』為中心的探討〉，《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12年。
- 龔克昌等評注：《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

伊藤正文：〈所謂紀行のについて——『遂初賦』『北征賦』をめぐる〉，見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事業會編：《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

David R. Knechtges, "A Journey to Morality: Chang Heng's 'The Rhapsody on Pondering the Mystery'," in Chan Ping-leung ed.,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Hong Kong: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82), pp.162-182.

—————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in *Transactions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9), pp.1-23.

Paul W. Kroll, "On 'Far Roam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4 (Dec. 1996), pp.653-669.

On the Convention of Poetic Travelogues in the Rhapsody (Fu) and Its Formation : Focused on Liu Xin (c.50BC-AD23)'s “Fu on Fulfilling My Original Resolve”

Ding Han^{*}

Abstract

The rise of poetic travelogues in the rhapsody (*f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quantity, bu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vention which is comprised of topics, contents, structures, techniques and styles. This convention had been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enriched by later generations. My article attempt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travelogues through tracing the major source of convention served as a prelude of Liu Xin (c.50BC-AD23)'s “*Fu on Fulfilling My Original Resolve*” back to the earliest Classics, such as *the Book of Songs* *the Songs of Chu* and other earlier literary writings on journeys. Light is sh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arliest pieces of works and the mature of poetic travelogues in the Han *fu*. Last but not least, I address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Liu Xin's works and conclude that it play an inspiration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convention of this specific genre of *fu*.

Keywords: Poetic travelogues in the rhapsody (*fu*); “*Fu on Fulfilling My Original Resolve*”;
Convention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